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 汉魏六朝诗论丛

余冠英 著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 汉魏六朝诗论丛

余冠英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六朝诗论丛 / 余冠英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

ISBN 978-7-100-15124-5

I. ①汉… II. ①余…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  
中国—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文集 IV. ①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025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本书据中华书局 1962 年版排印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

汉魏六朝诗论丛

余冠英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5124-5

---

2017年12月第1版

开本710×1000 1/16

201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3¼

定价:75.00元



余冠英

(1906—1995)

黃梅節近畫冥，湖上秧歌一路忙。  
細雨牛耕畦浪白，晚晴鴉帶舍煙青。  
垂粟對黃生樹叢，漢頭綠漲萍隔岸。  
酒家新釀熟，賣魚艇子傍橋停。

村居即景

錄舊作一首原

庚午同志雅命

蔚美年六十六



作者手迹

#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 (120 周年纪念版)

### 出版说明

商务印书馆自 1897 年始创,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于建馆翌年便出版了《马氏文通》,这部学术经典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百年学术出版的序幕。

其后,商务印书馆一直与中华现代学术相伴而行,出版了大批具有鲜明原创精神并富于学术建树的经典著作,诸多开山之著、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馆首次问世。这些学术经典的出版,使本馆得以引领现代学术发展,激动社会思想潮流,参与民族新文化的构筑,也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荣光。

1949 年以后,本馆虽以译译世界学术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侧重,但原创学术著作的出版从未止步。2009 年起,我馆陆续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全面整理中华现代学术成果,深入探寻现代中国的百年学脉。

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1980 年代末中国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

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心理学、科学史等众多学科。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录各学科学派的名家名作,展现传统文化的新变,追溯现代文化的根基。丛书立足于精选、精编、精校,冀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更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昭示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于思想性和独创性上皆可等量齐观,为中国乃至东方学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地位。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0岁的生日。为纪念本馆与中华现代学术风雨同行的这段历程,我们整体推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200种),既有益于文化积累,也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诸位学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两个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传承前辈的出版精神,迎接时代的新使命,且行且思,我们责无旁贷。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年11月

#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 前 记

中国诗里可以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由三百篇以来的民间诗歌的传统;这个传统二千年来从未断绝,它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生活,从民间产生的艺术创作的传统。另一个就是文人诗的传统,这是过去的中国文学史里所讲的主要内容。但这二者之间是有关系和有联系的。鲁迅先生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鲁迅书简》致姚克第十七信)就文学史的源流演变考察,鲁迅先生这话是完全正确的。民间文学的内容极其丰富生动,因为人民的生活和语言本身就是生动丰富的;而这也就是传统的文人所以要模仿它的原因。但民间文学也有它的难以避免的缺点;因为封建社会里的人民还没有可能掌握文化这一武器,因此民间作品也就很少集中和提高自己的机会,所以“里巷歌谣”的发展进步的情形就比较缓慢,艺术就比较粗糙;但这些都掩盖不了它那内容上的丰富与光彩。在文人开始向一种民间诗体拟作或学习的时候,他的作品立刻就会从民间文学中吸收到多量的健全的血液,使他的作品显得异常光辉生色。又因为文人是有一些文化知识的教养的,因之当他开始拟作或学习民间文学而还没有到“越做越难懂”的时候,他是可以给民间文学以一定的集中和提高自己的。我们文学史上有许多著名的诗人,他们所以能有伟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就

是因为他们直接(从歌谣)或间接(从保存下来的乐府诗)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健康的营养;屈原这样,曹子建这样,杜甫、白居易,无不如此。毛主席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产,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使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相形见拙,它们是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清楚地说明了民间文学的宝贵价值,和以民间文学的健康特色为基本内容的加工后的文学作品的价值。

就中国诗说,诗经是一部很早的民间诗歌的总集,是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的;但自被儒家奉为经典以后,对汉以后诗歌的影响远不如乐府诗的力量大。我同意本书著者余冠英先生的看法:“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构成一个传统,却是汉以后的事,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乐府诗选〉序》)唐宋人所盛称的“汉魏风骨”,白居易很佩服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社会诗,而把他自己做的社会诗叫做“新乐府”,都是指乐府诗中的那种健康的人民性说的。以后北朝乐府的直率爽朗的风格,南朝新声杂曲的爱情描写,都给了后来的诗人和诗以很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诗,就不能不特别注重乐府诗的这个传统,和它所给予文人诗的伟大影响。

余冠英先生是研究乐府诗的专家,并由此旁及而对汉魏以来的文人诗也有很精湛的研究;多年来他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及“汉魏六朝诗”等课程,课余之暇,常发表一些有研究心得的文章;现在就把有关汉魏六朝诗的一部分,编为这一本书。其中《〈乐府诗选〉序》一篇是他为郑振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艺丛

书》中《乐府诗选》一书所写的序文,文中说明了他对乐府诗的估价和看法,而这看法是贯串在本书的各篇文章中的,因此也不妨视为本书的总序。以下六篇,是解释诗句的含义和歌辞的分合等问题的;问题虽似不大,但了解意义是研究或阅读诗歌的初步工作,实际是非常重要的。乐府诗中的词句本来有许多很难解,特别是汉乐府;以前虽也有些人做过解释训诂的工作,但大都是采用“汉人解经”的传统办法,注重出处训诂,而对诗意和乐府诗的精神却每每多忽略;他解释的态度既不似训诂家之穿凿附会,也不似一些人“不求甚解”式的“以意逆志”,他能本着乐府诗的精神别求新解,使诗焕然生色,而又言必有据,从历史和诗本身来证明这解释的正确。譬如“公输与鲁班”一句诗(《玉台新咏》古诗八首中之第六首),以前人只用力考证公输与鲁班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作者也考证过了,但他却解释说:“公输与鲁班可以分指两个人……但‘公输与鲁班’这句诗却不一定非照此解释不可。……它的语气虽似指着两个人,意思还是指一个。这样的句法不仅有加重语气的效果,还有些诙谐意味,可以见出民间文学的活泼性。”他还举了一些证据,说明这样解释不只是可喜的,而且是可信的。其余有两篇论文人诗的,蔡琰和曹植,都是和汉乐府渊源很深的人物。论蔡琰一文虽专在考订悲愤诗的真伪问题,但他相信五言悲愤诗一首是蔡琰所作,似乎与乐府诗风格的比较也是促成作者立论的一因。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由他的诗中正可看出乐府对文人诗的伟大影响来。《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与《七言诗起源新论》两文是有关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文章,不属于论诗的范围;但《乐府诗集》一书是收罗乐府诗最完备的书籍,这种细致的考订工作是会对爱好乐府诗的人有帮助的,因此也收在这里。这篇文章是沿用了

考订文字的传统格式写的,作者用了文言,只是为了体例的方便。在《七言诗起源新论》一文里,作者考订七言诗的来源是民间歌谣,“体制上的一切特点都可在民间歌谣里找到根源”,正可见出作者平日治学一贯重视民间文学传统的精神。他和李嘉言先生讨论七言诗起源的文章也有助于这问题的阐明,因此也一并编在后面。从本书的各篇文章中,读者是会对乐府诗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的。

余冠英先生于本年十月底到中南区参加土改去了,需时约四个月,因与书局已有交稿成议,他又来不及亲自编定,因此嘱我代为编排一下,并略加题记。他这些文字在发表的当时我就全读过,平日也常在一起讨论这一类问题,因此就毅然答应下了。但如果在编排次序上或序文介绍中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那是应该由我来负责的。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日王瑶于北京清华大学

# 目 录

《乐府诗选》序 .....	1
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 .....	17
汉魏诗里的偏义复词 .....	27
说“公输与鲁班” .....	33
说“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 .....	38
吴声歌曲里的男女赠答 .....	42
谈《西洲曲》 .....	50
论蔡琰《悲愤诗》 .....	55
建安诗人代表曹植(一九二至二三一) .....	65
《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 .....	77
七言诗起源新论 .....	95
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 .....	119
附录	
《汉魏六朝诗选》前言 .....	131
《三曹诗选》前言 .....	157
关于《孔雀东南飞》疑义 .....	179
余冠英先生学术年表 .....	徐公持 187
记余冠英先生及其学术 .....	徐公持 190

## 《乐府诗选》序

一

乐府诗是由乐府机关搜集、保存，因而流传的，我们谈乐府诗不得不走一条老路，从这个机关开头。根据东汉历史家班固的话，我们知道汉武帝刘彻是“始立乐府”的人。“乐府”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它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搜集歌辞和训练乐员。这个机关是相当庞大的，人员多到八百，官吏有“令”、“音监”、“游徼”等名目。

经过汉初六十年休养生息，中国人口增加了不少，财富也积累了不少，好大喜功的刘彻凭这些本钱一面开疆辟土，向外伸展势力，一面采用儒术，建立种种制度，来巩固他的统治。由于前者，西北邻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到中国来，引起皇帝和贵人们对“新声”的兴趣；由于后者，“制礼作乐”便成为应有的设施。这两点都是和立乐府有关的。班固《两都赋序》说：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  
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这里说明了刘彻这时才有立乐府的需要，也才有立乐府的条件。

《汉书·礼乐志》说：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这里说明了乐府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采诗”，就是搜集民歌，包括歌辞和乐调。《汉书·艺文志》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这里说明了采集歌谣的意义，同时说明了那些歌谣的特色。刘彻立乐府采歌谣的目的是为了兴“乐教”、“观风俗”，还是为了宫庭娱乐或点缀升平，且不去管它，单就这个制度说是值得称许的。一则当时的民歌因此才有写定的机会，才有广泛流传和长远保存的可能。二则因此构成汉朝重视歌谣的传统，使此后三百年间的歌谣存录了不少。这在文学史上是大有关系的事。

有人以为在刘彻之前已经有了乐府机关，说班固弄错了事实，因为《史记·乐书》说：

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以增更，于乐府习常隶(肄)旧而已。

但这也许是以后制追述前事。《汉书·礼乐志》也曾有“孝惠二年



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之文，正是同类。其实立乐府是小事，采诗才是大事。乐府担负了采诗的任务，才值得大书特书。从“习常肄旧”这句话正可以看出武帝以前纵然有乐府，也不过是另一种规模的乐府，那时绝没有采诗制度。既然如此就不必相提并论了。

乐府采诗的地域不限于“赵、代、秦、楚”，《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各地民歌有：

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

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

邯郸、河间歌诗四篇；

齐、郑歌诗四篇；

淮南歌诗四篇；

左冯翊、秦歌诗三篇；

京兆尹、秦歌诗五篇；

河东、蒲反歌诗一篇；

雒阳歌诗四篇；

河南、周歌诗七篇；

周谣歌诗七十五篇；

周歌诗二篇；

南郡歌诗五篇。

从这里看出采集地域之广，规模之大。但总数一百三十八篇却并不算多，大约此外还有些不曾入乐的歌谣。也许汉哀帝刘欣“罢乐府”这件事不免使乐府里的民歌有所散失。《汉书·礼乐志》说刘欣不好音乐，尤其不好那些民歌俗乐，称之为“郑卫之声”。偏偏当时朝廷上下爱好这种“郑卫之声”成了风气，贵戚外家“至与人主争女乐”，使刘欣看着不顺眼，便决心由政府来做榜样，把乐府里的俗